

网络技术的人文视野

欧阳友权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面对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网络技术, 作者主张人文学者需要冷静的理性沉浸和观念考辨, 以廓清其负载的人文价值并加速其文化律成。作者以人文方法论理论视角对互联网文化进行本体论追问, 主张用人文关怀来审视数字化网络技术的意义和功能, 在无远弗届的赛伯空间里追索人文化的目的和价值; 同时阐释网络旨趣的人文诉求, 如意志的自由、知识的民主、交往的平等和信仰的重塑等, 倡导通过人文信仰的永恒冲动, 以价值理性防范和抗争网络时代的工具理性, 以此探求人文学方法之于网络文化研究的适应性。

关键词: 网络文化; 人文视野; 本体论追问; 价值诉求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2-0253-05

网络是一种技术。当人类发展网络技术时, 不会背弃人文的动机和目的。任何一门技术都是伴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的, 从一开始它就体现着人类改造与控制自然的权力意志, 并给予自然和人类自身施加巨大的影响, 因而在以人文方法论考辨网络技术的时候, 必须确证人性与价值的先在性。互联网的无远弗届和触角延伸不只是一种技术拓展或工具创新, 更是一种价值负载——网络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律成。不过这种价值不是自因自明的, 而是需要理性沉浸、哲学追问和观念规约的。

一、数字化技术的人文本体论追问

被称作“数字革命传教士”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教授在他的《数字化生存》中宣称, 人类社会已进入“比特”的时代, 正以“信息DNA”重建世界, 媒介革命的横空出世带来的生存新定义, 无限宽带创造的人类新空间, 产业大变革建立的地球新秩序, 虚拟现实的人性化界面, 以及后信息时代的数字化生活方式等等, 足以让人类豪迈地步入“乐观的年代”, 安享曼妙绝伦的“数字伊甸园”^[1]。然而, 现代高科技的圣火在照亮人类光明前景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灼伤人类自身。例如, 互联网的延伸与网络犯罪同步增长, 计算机信息产业给

世界经济指数带来的增长与计算机黑客对经济的破坏与日俱增等, 足以击跨人类对数字化信息科技的乐观和盲从。据统计, 网络犯罪正以年均 105% 的速度增长, 在全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仅 2000 年就达到 700 多亿美元, 网络黑客恣意为对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带来危害, 计算机病毒的日新月异和防不胜防常常是源于技术狂徒的智力游戏和欲望冒险。大而言之, “科学沙文主义”的阴影更是玷污着技术进步的每一个足迹, 如 20 世纪军备竞赛产生的 5 万枚核弹头将人类推到了战争和仇杀的火山口上, 其核威力足以将人类炸回到旧石器时代; 技术经济导致的生态灾难使得平均每 4 分钟就有一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 人类发明的航天器及其导向与定位系统使制造“9·11 事件”的恐怖分子得以准确无误地实施疯狂的预谋, 让现代科技文明象征的纽约双子塔楼在全世界惊恐的目光中轰然崩塌……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他们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中所追问过的那个老问题: 为什么笛卡儿开创的新科学的理想——数学宇宙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噩梦中化为泡影? 为什么在培根、笛卡儿、伽利略所热烈呼唤的新时代里, 人类并没有进入一种真正的人类状况, 而是沉沦到一种新的野蛮之中?

人类对科学神话的反省和对技术目的的追问,

收稿日期: 2003-0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BZW00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01JA750·11-44043)。

作者简介: 欧阳友权(1954-), 男, 湖北竹溪人, 中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理论。

在逻辑上必然延伸出两个话题:其一,科学是一柄双刃剑,它能为社会进步开辟胜利的航程,也可能会成为毁灭人类的掘墓者;其二,技术并不是像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中性的,只是那些创造和使用技术的人使得技术成为一种善的或恶的力量;相反,技术是负载着价值的,具有其作为伦理、政治、人性、文化等诸问题的丰富含义,它在体现技术判断的同时也体现价值判断。例如,中世纪寺院机械钟表的发明适应了当时僧侣们有规则的祈祷生活,汽车工业的勃兴体现了资本家“时间就是金钱”和效益最大化追求的信念,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诞生于美国,不仅源于冷战期军备需要,也与美国人对个性自由、平等交流、民权分享和隐私权的倚重有关。所以技术所体现的不仅是技术判断,还要体现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以及那些设计和用它的人的利益。正如斯塔迪梅尔(John M. Staudenmaier)在论及技术的社会性时所言:脱离了它的人类背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着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包裹。那些设计、接收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得利益必将体现在技术的身上^[2]。

基于对技术的不同理解和对科技与人文关系的关注,许多人面对技术的无限制扩张与虚无主义膨胀,毅然为技术的发展辩护,视技术为人类的福祉和永不消歇的社会进步因素,并认为技术才是建立平等社会的最可靠的凭藉,因为科学技术创造出空前规模的生产力和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足以坚定人们对它的无限信任;但另一些人文主义者却留意于技术进步中人性的尊严和人的精神价值,对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文化断裂与人性戕害等持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这种批判从亚里斯多德对工匠技艺的蔑视中就初见端倪,18世纪以卢梭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者视新生的机器文明为恶魔;19世纪则有非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运动以生命的表现与技术世界图景相抗争;迎击20世纪新技术浪潮的,有存在主义对技术本源的人学追问,又有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技术的猛烈抨击。直到今天,有关原子恐怖和生态主义、反技术运动和后现代主义等鞭挞“技术拜物教”的声音仍不绝于耳。

这一切都在警示人们,在互联网把这个世界一“网”打尽的今天,人类不能仅仅从技术本身来看待网络技术,而必须从人性、人文、人伦、人生、人类的角度,以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来审视网络的意义和功能,在数字化的赛伯时空中追索人文化的目的和价值。

于是,在数字化技术席卷而来时,人类不要吝啬

对人文的本体论追问和目的论思考。这种追问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现代技术与人的生命向度。即这种技术能否使人类更加珍视生命,热爱生命,敬畏生命的天然合理性,尊重生命的自然历史过程,并排斥贱视生命的观念,抵制和抗争涂炭生灵的暴行。

其二,网络科技与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即网络能否使人类得以符合人性的、自主的、作为真正的人来生存,而不是像动物那样活着。在人文哲学的视野中,人之为人的生存不仅需要有丰衣足食,还要有精神的追求、生存的境界和对理想的憧憬;不仅要使每一个体安享当下的幸福生存,还要尊重后代人合理享受的同等权力,保证生存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在生存中协调好天人关系、社会关系、身心关系,还要有利于丰富人的个性、创造性和自由本性。即如美国的人文主义者芒福德(L·Mumford)所说的,技术进步的目标应该是关注人类成长过程中的所有方面,而不是只关心科技需求的功能;人类活动的基础是精神,人类要想在现代技术“巨机器”面前有尊严的生存,就不能把自己完全交托给技术,而应该审慎地考虑人类本性与技术的关系^[3]。因为早在人类正式出现之前,动物界建造的复杂的鸟巢、海狸的水坝、蜂窝、蚁丘、大猩猩的谋食工具等,就已经有了大量的技术发明。人类的技术发明不管多么先进和复杂,如果不能在技术的圣殿上添加人文的装备,这种技术在质的规定性上仍然不能与动物界的生存本能区分开来。

其三,数字化生存与人活着的目的与意义。即技术的赐福能否使人们既知道“何以为生”,又明了“为何而生”;不仅活得快乐,而且活得高尚,并且以活得高尚为快乐;不仅善于“为稻粱谋”,还要能够“为天下忧”,懂得理解、顾及他人、社会和自然的需要,从而把科技追求“事实的知识”与人文追求“价值的知识”统一纳入人类的认知视野,让科技前沿探索与知识创新的旋律中渗入人性原点的伦理情感和人文情怀。因而从“原道”之意义上,数字文明的峰峦仍然需要高标“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康德);“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普罗泰哥拉)等字眼。在现实的选择上,人类更要警惕在技术的凯歌声中变成价值迷失的羔羊或“思想的失踪者”。人一方面要重视人,重视人的幸福、人的权利,重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尊重人格独立和平等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人又要挣脱技术依赖、工具束缚和物欲诱惑,使自己真正成为精神上自觉、自主、自由的人,谨防失落人之为人的理性自觉、社会责任、精神修养和道德理想。否则,

当技术进步飙升为技术沙文主义的时候,当人们从技术的福祉中获得多彩而巨大的商品堆积的时候,他们将被引渡到两种不寒而栗的可怕境地:要么他必须投入这架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中,用“技术之手”大把地捞钱,以满足被消费社会鼓动起来的物欲追求;要么被激烈的社会竞争所抛弃,失去生命的激情而沦为一片枯萎的败叶。

最后还应该追问数字化社会中人的主观合目的性与客观合规律性能否实现统一的问题。卢梭曾尖锐地指出:科学技术与人类的主观目的时常是背离的,如天文学诞生于迷信,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因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失了,而“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仪那种虚伪一致的面幕下边,隐藏使我们夸耀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依据的那种文雅背后”^[4]。海德格尔则认为,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产物,是笛卡儿的主客体二元论导致现代技术的勃兴,并通过尼采的权力意志怂恿现代技术虚无主义的发展。这种执拗于存在遗忘之中的技术中心论缺少对人的本体论的追问,从而构成我们时代的最高危险。不过他引用荷尔德林的话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正是在现代技术所导致的危机的最后时刻,走出危机的希望也应运而生,这种希望就蛰伏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之中。实际上,技术本质的哲学追问最终会凸现为主观合目的与客观合规律的价值统一问题,只有从作为技术的创造者的人的终极关怀出发,从技术的社会文化条件和技术后果出发,全面分析技术与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深入考量技术之于人性的意义和价值赋予,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把握现代技术的本质。科学史家萨顿曾将科学、宗教、艺术分别对应于人文价值的真、善、美,认为它们犹如金字塔的三个面,当人们站在塔的不同侧面的底部时,它们之间距离很远;但当他们爬到塔的高处时,它们之间的距离就近多了。人文本体论和文化目的性的价值支点,就是登临这个塔尖的阶梯。

二、网络旨趣的人文诉求

在以技术和经济因素为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网络的旨趣表面上是诉求于工具理性,实际上却是越来越渴求于人文精神、越来越依赖于价值理性。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技术的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迫切需要精神层次的思维统觉,以解决因人文精神缺失而驾驭、统摄不了浩如烟海的信息资源,从而出现“科学—社会—人”的关系失衡和价值不对称,以及

由此导致的科学创新的停滞和衰退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网络兴盛于20世纪80~90年代世界冷战“雅尔塔结构”解体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的循环突破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语义学背景,却又强化了全球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引发了尖锐激烈的文化心理冲突。当信息高速公路上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得以在全球以兆位乃至吉拉比特的速度流动的时候,当欧洲许多国家取消签证、统一货币,欧洲经济区、美洲自由贸易区和环太平洋经济共同体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大三角而鼎立天下的时候,人们忽然发现,全球化带给人们的不仅有跨国公司和产业重组,还有民主、人权、国际关系准则的巨大差异,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巨大矛盾,技术与人性的鲜明落差,以及人类对人文精神的深层渴求与依赖。这时候,科技进步不能只停留在“感性”领域和“知性”层次,而应该挺进“理性”的科技哲学领域和人文精神层次;人的发展不仅要有居里夫人式的艰苦的技术实验,还要有爱因斯坦那样的源自灵魂的“思想爆发”,从而把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技术智慧与终极关怀、“技治主义”与人道慈爱协调起来,实现科技进步的人文化、科学效果的人性化、技术社会的人道化,这样才不会使技术的福祉成为悬浮于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利剑,才会有人类文明元典和人性原点的同步和统一。这种有人文精神底蕴支撑的技术进步正是马尔库塞所倡导的“自然的解放”,因为“由科学进步所葆有的想像力一旦从剥削中解放出来,就能够将其生产性的能力转变为经验与经验的重建”,而“世界的合理性重建将导致一个由人的美学感性所构成的现实”,“创造一个在其中人的非攻击性的、爱欲的、接受性的官能,与人的自由意识共同服务于人与自然的和解的环境”^[5]。

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出现正是源于人与环境的和解,其观念基础是如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旨趣”,而不是“技术旨趣”——是人文、社群和经济、伦理的诉求奠定了网络技术的价值根基。微软帝国的成功,固然离不开创业者锲而不舍的坚韧品格和顽强进取的科学探索精神,但更离不开他们对现代社会架构、人类精神需求和社会心理的理解与迎合。比尔·盖茨和他的同伴们将他们所理解的现代社会人性化诉求——如个性独立、平等交往、意志自由、信仰多元、资源共享、市场机会扩展、跨境交流等,用“比特”的技术演绎实现出来,创造了可用于世界收缩而信息扩散的视窗平台,从而为世界新经济起到了伟大的支撑作用,是人文主义背景和数字技术的合谋打造出了“世界首富”的幸运儿。如果追索到发明微积分的莱布尼茨,发现“三定律”的牛顿,发现天体演化的

布鲁诺·康德,甚至像解答“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等,他们的科学思维无一不是超越了实证科学“一加一等于二”的层次,而升华到了人文精神和哲学素养的境界。美国著名评论家诺曼·克森斯(N. Cousins)曾在《计算机与诗人》一文中尖锐指出:“当人类无法辨别计算机的中继运算与人类的理性判断和心灵良知的终极责任时,计算机就可能成为偏离正题的东西。”^[6]

康德曾经说过,人类的“理解力”的功用在于认识世界,获取知识,并技术性地改造世界;人类的“理性”的功用在于思考世界,为生活世界提供“意义”,并对技术运用提供思想指导,他号召人们“推拒知识,以便为信仰留出空间”。后来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等人呼吁“欧洲科学的危机”“存在的被遗忘”“人的单向度化”等,技术的心灵旨趣和人文诉求一直响彻在科技文明史的每一扇窗口。历史一再证明:只有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为作为解放力的人文精神服务的时候,它才是福音;相反,如果简单地把科技进步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惟一标杆,或者将技术霸权认同为人文诉求是否得以合法存在的仲裁者,那它只可能带来灾难。价值理性的任务就是在新技术的剑锋上锻铸道德律令和制度约束,让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一道回归“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的人学命题。

具体来说,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人文旨趣大抵诉求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意志的自由。互联网是一个没有控制中心的开放式网络,它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每一个体的自由意志。在这片自由的天空中,网民可以充分享受到进出网络的自由、选择身份角色的自由、发表言论的自由、与人交往的自由、选择信息的自由等。当然,网络上的自由是以奉行理性、平等、宽容等人类共处和交流的基本准则和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为前提的。自人类创造人体以外的传播媒体以来,网络媒体是迄今为止最能体现人的自由意志的大众化媒体。我们知道,技术(包括网络技术)导源于人类的“求知意志”,人文精神则源于“意志自由”,因此在技术时代,人容易沦为“求知意志”的奴隶;而在信仰时代,人的自由意志易于被“无知”和“盲从”所蒙蔽。意志在朝着“自由”迈出的第一步时,为了实现自由,常常要以放弃一部分自由为代价,即科技进步总是在自然界的必然和精神界的自由之间存在一定的裂隙或虚位,从而限制了自由意志。如海德格尔在《关于技术的追问》中所言:在技术世界,人们不“思”,他们粘滞于存在者,忘记了存在,沉溺于现代技术的控制,拒斥人进入原初的展现并进而去体验更原初的

存在,而现代技术的追问就是要“使人获得一种我们在现代世界中所拥有的独特地位,变成为主体,高踞于所有存在者之上,统治和支配着世界。”^[7]网络的起点是“求知意志”,终端则是“意志自由”,而这种自由是通过“个体的孤独化狂欢”和“信息耗散的充分涌流”来实现的,所以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拒绝了主客“二元分立”的形而上学,而使意志的自由挺立在这样的文化观念平台:立足技术前沿,高擎人文精神。

二是知识的民主。人文精神的构建离不开知识的传承和教化,网络的出现为知识撒播打通了最为便捷的民主化渠道,为知识信息的最大化交互和最优优化利用提供了蛛网重叠和触角延伸的全新方式。在社会分工的制度模式下,专业知识的纵向积累和横向分割造成了知识增长与信息壁垒的同步延伸,隔断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和理解,形成了如哈贝马斯所说的“专家文化”和“知识精英”。问题在于:专家文化的知识权威有时并不提供生活的意义(如技术知识),一旦专家文化摧毁了传统意义的权威(如上帝)之后,人的意义也将随着信仰的隐退而消失(“上帝死后,人之若何?”),这便是弥漫于20世纪西方思想界的“现代性危机”。互联网则提供了一种技术可能性:在不破坏甚至有助于专业分工的前提下,以快捷方式和廉价手段为大众提供接近各种专业知识的机会,其意义不仅在于“公众理解科学”,还在于知识走进生活、科学接触人文、技术贴近生命力的感受,这便是知识民主化的人文精神价值。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以“Linux”为代表的自由软件运动(free-source movement)。1991年,21岁的芬兰大学生Linux Torvalds在学生宿舍里编写了一个操作系统的内核Linux,并将其源代码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目的是建立不受商业软件版权制约的、全世界都能自由使用的Unix兼容产品,从此引发了全球程序员和电脑爱好者的开发热情,经过全世界千百万网民的增补、修改和传播,Linux已被雕琢为一个全球最稳定的、最有发展前景的操作系统,并可与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分庭抗礼。“开放源代码”精神所倡导的知识民主和资源共享,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技术本身,而表达了人类社群对技术垄断的抗争和对知识民主化的人性渴望。

三是交往的平等。互联网为现代人提供一个比以往任何一种交往方式都广阔得多的对话界面,它培育和强化了一种关注个体、尊重平等的文化形态,是对传统金字塔权力控制模式的价值、效率和存在必要性的直接否定,又是对个体参与精神的激励和平等交往伦理的张扬。而且,由于互联网可以无限地横向扩展和相互交流,每一个节点都是平等参与

交往的自由个体,这就使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人类的智慧和经验来强化交往的平等观念,以人性的心灵沟通来达成“对话的逻各斯”,打造出为哈贝马斯所倡导的那种“交往伦理”,为沉溺于物欲焦虑中的现代人搭建一个平等对话、倾吐心曲的栖息地。在网络的平等王国里,现实社会中的等级、特权、财富、身份、背景等因素都失去效应,用于日常生存智慧的角色面具被匿名的主体所替代,只有鲜活的自我在以最“无我”的方式来表达最“真我”的本色。于是,平等交往与尊重个体结伴而行:互联网的游戏规则尊重个体自由——可以自由进出、自由访问网站、自由发表言论等;尊重个体的创造性——可以自由建立个人网页,发表自己的观点或作品等;尊重个体对自我的选择——虚拟社区真实自我的表现和确认;尊重个人的尊严——不能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也不能强迫某人接受别人的观点。由于网络的平等交往具有技术上的保障,它对现实社会奉行的权威意识和等级观点将是一次彻底解构,同时也将提升人的个体权利,强化以个体尊严为前提的人文主义文化意识。

最后还有信仰的重塑。网络的文化逻辑源于后现代的信仰危机,而网络文化颠覆传统信仰的过程又是一种在体认中质疑、在解构中重构的过程。因为信仰的危机是基于信仰的裂变与转型,信仰的缺失将带来信仰的追寻和确认。网络,尤其是“万维网”有两个典型的技术特征:一是超文本(hyper-text),即将思维文本体系里的语词、陈述、判断等,随着体系的扩张而在体系内部其它语词、陈述、判断那里自足地获得注解和印证,从而将思维外化为平面化网络体,人的大脑也被万维网外化为网络“思维”的一部分。结果,简单元素的复杂链接造成“惟一”

和“中心”观念的彻底解体,信仰和权威失去了存在的可能;二是网络记忆体逐渐取代大脑记忆体,从而将思维平面化,“正如同普遍使用‘文字’使人们逐渐忘记了对生活的直接体验一样,普遍使用‘万维网’会使人们失去思维的‘深度’。文字的使用(符号记事)与万维网的使用都倾向于降低大脑记忆体在人类理解过程中的作用。”^[18]这种平面化思维带给人类的将是“深度的丧失”和随之而来的理性本身的危机——对理性的信仰被思维“外化”所动摇。英特网上不断涌动的“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原教旨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技术意识形态”的争论,正是网络时代信仰危机和信仰重塑的表现,不过支撑它们的仍然是人文信仰的永恒冲动,在这种冲动的背后仍将潜沉着人文积淀之于网络文明的适应性。

参考文献:

- [1]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 [2] 高亮华. 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4-15.
- [3] Mumford Lewis. Technics and the Nature of Man.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M], ed C. by C. Mithcha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3. 77-78.
- [4] 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10.
- [5] Marcuse Herbert.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M], MA: Beacon Press, 1969. 31.
- [6] Cousins Norman. The Computer and the Poet, A Course in General English Reading for Doctorate Students[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2.
- [7] Heidegger M.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7. 147.
- [8] 汪丁丁. 网络技术与人文主义[J/OL]. <http://www.phil.pku.cn/post/paper/14.htm>

The humanistic ken of network culture

OUYANG You-q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Fac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network technique, humanists should be calm and rational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humanities value and promote its culture form. The author questions the ontology of the network culture from the humanistic methodology's angle, advocates humanism in examining the sense and function of the digitalized network technique, and explores the purpose and value in the cyberspace. Moreover, it expounds the humanistic pursuit, such as freedom of will, democracy of knowledge, equality of communication and rebuilding of a faith, initiating the use of the value reason against the network tool reason through the humanistic emotion,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adaptability of the humanistic methodology to the network culture.

Key words: network culture; humanistic ken; ontology questioning; appeal for value